

建国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研究

程家福¹, 董美英²

(1.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法政学院, 合肥 230022; 2. 南京晓庄学院 陶行知研究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 建国初期, 政权更替, 社会转型, 在新的社会结构体系重构过程中, 高等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等教育通过大学生工农化和速成化, 把旧社会的弱势群体工农变成新社会的强势阶层, 快速地塑造出新的社会统治精英, 同时, 把旧社会的强势阶层大多阻隔在社会的下层。在社会转型期, 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更多地发挥了社会重构的功用。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社会功能; 重构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2X(2012)10-0089-05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意味着工农政权的确立。政权更替, 社会转型,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高等教育起到了社会结构重构的功用。1950年代, 新政府根据国民在旧社会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料的占有状况, 把当时的国民分为地主、资本家、开明士绅、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¹³种家庭成分, 这13种分属于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类。剥削阶级是旧社会的强势阶层, 无产阶级是旧社会的弱势群体, 在新社会, 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剥削阶级成为被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成为新社会的强势阶层。如何使这种强势地位合法化而且能够实现代际之间的传递, 进而使这种强势的社会地位固化, 保持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是时代提出的迫切命题, 具有强烈的社会升迁意义的高等教育无疑能够担当起这个社会重任, 它使在政治、经济上翻身的工农, 在文化上也

翻身, 成为真正的社会强势阶层。

以往的研究者多把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定位为大众化的高等教育, 这常常引起人们的误解, 认为当时的高等教育是面向大众的, 旨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教育。这是把现象当成了实质。面向工农大众的高等教育, 其目的是培养属于工农阶级的统治精英, 或者说高等教育使统治阶级工农化。把原来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社会底层——工农变成社会的上层, 把原来的统治精英变为社会的下层, 使之成为被统治者。高等教育起到了强弱阶层的重构功用。这种重构是如何实现的呢? 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重塑社会精英

工农在建国前一直处于社会的最下层, 其在高等教育中所在份额甚少, 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原来社会强势阶层的再生产。清华大学1924年的学生出身状况可以说明此问题(见表1)。民国时期的强势阶层官、学、商占去了将近80%的高等教育份额, 而当时占人口90%的工农只占了3.8%的份额。黑龙江省刚解放时, 地主商人子弟占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贫下中农子弟还不到10%。^[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 工农中80%是文盲, 其干部文化层次也很低, 受到高等教育的更

收稿日期: 2012-09-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青年课题(09YJC880001);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11-12D93)。

作者简介: 程家福(1972-), 男, 安徽合肥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 董美英(1972-), 女, 山东济宁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教育公平。

是少之又少,这样的工农统治基础,这样的干部队伍如何能够胜任国家管理和建设的重任?建国后的工农政权面临着如何通过高等教育塑造工农统治精英的问题。为了解决此问题,采取了大学生工农化和大学生速成化的策略。

(一) 大学生工农化

1949年12月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以工农为主体……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便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2]向工农开门,成为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基本招生政策。

表1 清华大学1924年学生出身状况^①

父兄 职业	官吏	学界	实业界	铁路界	农业界	法律界	军界	其它
百分比	25.4	30.9	20.1	4.4	3.8	3.6	2.3	9.5

1. 高校招生中对工农的优惠

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向工农开门,增加大学生中工农、工农干部的比重,高等学校招生中实施了一系列对工农优惠的措施。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中,对录取标准做了特别说明“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华侨学生;”^[4]此后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规定,扩大工农进入高校的机会,其中包括对工农干部、革命军人和产业工人采取优先录取、降低分数线、免考外语等方式。《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中对机关、企业、学校、团体等的工作人员、转业军人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做出免试外语的规定。在《一九五四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录取办法的几项规定》中,规定对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合于优先录取条件的产业工人、工农干部,将其报告单单独抽出排列考虑分配。而且做出了加分规定,对于工农速成中学的考生每

门科目平均增加10分,总分增加50分;对于产业工人、工农干部每门增加15分,总分增加60分。对于直接培养社会管理者的文史、政法、财经等科,优先录取在职干部,1954年,该类高校录取在职干部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占该类新生的80%左右。^[66-67]1956年的招生录取办法规定,工人、农民、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农干部、复员军人、专业军人、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在职干部、烈士子女等在低于一般考生20分左右时应优先录取。^[209]

为了塑造出从事管理工作的政治精英,还采取了选送革命干部报考高校的办法。《关于保证完成一九五四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规定》中指出选拔优秀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和在职的专业干部20900人升入同类行制度的高等学校,条件许可时,各部门应尽可能选拔在职干部来代替上述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的名额。从全国县级以上各级党政、人民团体等各机关青年干部中按规定条件选送5000人报考各级高等学校。从转业军人中选派300人投考各级高等学校。而且该规定特别要求各级党委督促招生机构对在职老干部尤其是工农干部的录取标准予以适当放宽。^[54]

2. 高校招生中对剥削阶级子弟的限制

高等教育在向工农开门的同时,对剥削阶级子弟实行了限制的政策。通过政审和专业密级规定来限制旧社会的优势阶层进入高等教育。

政审,从1953年开始实行,此后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家庭成分体系瓦解。高校招生专业分为一般、机密、绝密三种,随着密级的提高对家庭成分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出身的考生一律不能进入各机密专业。1958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下列考生不予录取:

曾被判刑、被管制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政治历史复杂,尚未弄清分子;品质作风

^① 叶赋桂.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 1840—1922 [M] // 张斌贤. 大学: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2.

恶劣的分子;直系亲戚被处死,没有证明已确实划清界限的;直系亲戚因政治问题被判处徒刑、管制或直系亲戚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本人没有划清思想界限的;直系亲戚中有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本人没有划清界限的;亲密的社会关系因政治问题被我处死、判刑、管制,或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本人没有划清思想界限的;地主、富农、反动官吏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没有划清思想界限,表现落后的。

尽管在高校录取中一直强调“有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主要看本人”,但是在实际录取中是宁左勿右。

(政审)录取干部怕担责任,保险系数打得大,要求偏严。”^[608]1955年原中南区报考学生30385人,经审查,有严重政治问题未予录取者,有2093人,占该区报考人数的6.88%。^[94]1958年政治审查不合格为15.44%左右,1959年11.3%左右,其中各地高中毕业生不合格率为9%左右,高者达46%,低者仅占6%。^[354]1965年四川省考生80分以上1500多人,只录取1000人;70~79分的6700多人,只录取4400多人。80分以上落榜的500多人,70~79分落榜的2000多人,原因就是政治条件不好。^[603]1965年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中毕业生报考高等学校的有134人,录取92人,42人未录取,其中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一般的25人。^[591]北京市四中一考生数学竞赛高中二年级第一名,高考数学成绩全国第一,各科总评也是第一,高达89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有考上大学。^[588]

80分以上的考生有40%落榜,宁愿从低分学生中挑出身好、家庭社会关系干干净净的,也不要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606]。这样,通过严格的政审,把哪些旧社会的优势阶层的子弟就挡在了的大学门外。学校教育把一些学生向上流动,同时又把其他人分送到社会的低层地位。^[9]高等教育招生中的排斥行为,完成了把旧社会的强势阶层变成新社会的弱势阶层的社会重任。

(二) 大学生速成化

在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要实现它的社会重构功用,必须快速地完成新的社会精英的培养,否则不能满足急剧变革的时代要求。要稳固政权,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具有来自革命的工农阶级的各种人才。因此,为了实现工农政权社会精英的工农化,实施了大学生速成化的培养战略。

1. 创办工农速成中学

由于工农在旧社会一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各级学校的教育机会占有量都很少,在刚刚建国时期,高等学校的招生还是原来的优势阶层占了很大比例,见表2。大学生中三成到六成来自旧社会的强势阶层——剥削阶级,工农成分的大学生只占一两成,有的年份有的学校一成也占不到。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把旧社会的强势阶层又变成了新社会的强势群体,这与工农政权的国家性质是相冲突的。

由于高等教育是一种基础教育之上的人才培养机构,进入其中的人才需先有一个基础教育的培养过程,所以刚刚建国时的大学生还是以原来的优势阶层为多数。为了尽快改变此种状况,快速完成社会阶层的重塑任务,致力于快速增加高校中工农大学生的比重,从而创立了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政务院发布《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指出“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人民政府必须给他们以专门的受教育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由此看来,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使之能够胜任社会管理者的职位。这也就决定了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对象不是普通的工农而是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军事干部和军人等工农精英,据1953年的统计资料,工农速成中学在校学生28000余名,其中工农干部占56.3%,产业工人占25.5%,军人占18.2%。在全国工农速成中学中,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共有1572人。学生中还有厂矿干部459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和

人大代表郝建秀、杭佩兰、李洪兰、马恒昌、郑锡坤、马成林、李锡奎、王吉奎、朱世清、郭秀云等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治淮特等劳模金秀兰、解放军文艺战士高玉宝及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也就读其中。^[175]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员由机关、工厂、学校有计划地选送和抽调,高级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年龄 18 至 35 岁,学制 3 年,课程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基本课程。^[1]

表 2 建国初期高等学校学生出身状况

来 源	年 份	工 农(%)	剥削阶级(%)
全 国	1951	19.1	—
	1952	20.5	—
	1953	21.9	26.4
上海交通大学	1949	10.3	37.9
	1950	9.5	33.4
云南大学	1951	4	69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 1949 ~ 1978 年》, 作者根据上海某重点大学档案资料统计, 董云川、张建新《高等教育机会与社会阶层》第 61 页。

工农速成中学是高等学校的预备学校, 其学生一般可以直接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工农速成中学第一届 1 680 名毕业生中, 就有 1 622 人升入了高等学校。^[1]到 1955 年停办, 工农速成中学共招生 5 年, 招生 64 700 余名。^[175]通过工农速成中学的速成教育, 使大批干部得以进入高校深造, 成为新社会的有一定知识的管理者、建设者, 缔造出知识型的新社会强势阶层。速成中学作为建国初期特殊时期的产物, 就是为了满足快速塑造新社会统治精英的需要而设置的。

2. 大力开展专科教育

建国初采取了短期速成和长期培养统筹兼顾而以大量举办专修科为主的方针, 见表 3。1952 年工科专科生占 55%, 医科专科生占 50%。^[17]政府大力号召学生读专科, 1953 年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招生会议上呼吁“我们也热烈地欢迎希望同学们踊跃地参加专修科的学习”^[32]1952 年, 师范类高校本科招生 15 490 人, 专科招生 16 061 人; 体育类招收本科生 79 人, 专科 246 人; 艺术类招收本科生 247 人, 专科 3 340 人。1953 年, 政法类本科招收

1 740 人, 专科 2 168 人; 体育本科 106 人, 专科 990 人; 艺术本科 764 人, 专科 1 936 人。^[1]

表 3 建国初期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状况

年份	学生数/人	比重/ %	招生数/人	比重/ %
1949	22 587	19.4	—	—
1950	12 820	9.3	—	—
1951	4 0941	26.7	—	—
1952	59 860	31.3	—	—
1953	60 648	28.6	26 615	32.6
1954	58 573	23.1	27 003	29.3
1955	43 802	15.2	15 108	15.2
1956	52 789	13.1	36 631	19.8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 1949 ~ 1978 年》第 47 页

大量举办专修科为主的方针, 一是为了建设社会的需要, 同时更是快速塑造工农统治精英的需要, 通过对剥削阶级限制和工农优惠的高校招生政策, 更多的工农子弟及工农干部将进入大学进行深造, 而且可以快速地投入社会, 快速地构造出社会的强势阶层。工农和干部制的身份制度社会, 高校深造后获取的干部身份对高阶层的社会地位具有很强的固化作用。

此外, 还采取了诸如高校学生提前毕业、业余培训等办法, 以快速满足社会转型期对人才的需求。原应于 1953、1954 年毕业的文、法、财经、数、理、化等各院系大学生, 分别提前一年毕业。如复旦大学 1952 年提前毕业 487 人, 1953 年 ~ 1954 年提前毕业 720 人。^[1]

二、社会精英工农化

建国初期, 通过大学生工农化和大学生速成化, 共产党很快缔造出了属于工农政治联盟的社会精英, 工农子弟及工农干部在大学生中的份额逐年增加, 见表 3。根据环比和基比统计资料来看, 从 1955 到 1965 年, 高校招生中工农及工农干部数量每年均在递增, 发展速度为 197.92%, 增长速度为 97.92%, 平均发展速度为 135.45%, 个别年份增幅近两倍。

表4 建国初工农及工农干部大学生发展状况

年份	工农	工农干部	合计	环比	定基比
1951	19.1	-	-	-	-
1952	20.5	-	-	-	-
1953	21.9	-	-	-	-
1955	29.0	4.70	33.70	-	-
1956	34.1	4.47	38.57	114.45	114.45
1957	36.3	3.69	39.99	103.68	118.66
1958	48.0	3.95	51.95	129.91	154.15
1959	51.4	2.50	53.90	103.75	159.94
1960	54.6	4.80	59.40	110.20	176.26
1961	58.1	1.73	59.83	100.72	177.54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 1949~1978年》及本人计算

建国初期,作为工农代言人的共产党致力于快速提高高校中大学生的工农比例,其用意不仅在于满足社会建设的需要,更是为了满足社会工农精英培养的需求,以求巩固政权,保证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可见,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在当时主要起到了一种社会重构的功用。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5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建立起一种具有等级特征的高校体制……这一体制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培养一代新的政治精英,以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精英。”^[9]教育是一个对大众社会进行重构的重要工具^①,建国初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成功地完成了社会的重构。事实上,由于政权的变换,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学生社会阶层的深刻变

化,从而实现社会结构的重构。^[10]

参考文献:

- [1] 谢岚,李作桓. 黑龙江省教育史资料选编: 下编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17.
- [2] 杨学为. 高考文献: 上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3] [美] 珍妮·H·巴兰坦. 美国教育社会学 [M]. 李舒驰, 等,译. 北京: 春秋出版社, 1989: 62.
- [4]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M]. 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 [5] 金一鸣. 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1.
- [6] 方晓东,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2: 45.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 1949~1978年 [M]. 1980: 49.
- [8] 复旦大学百年志编纂委员会. 复旦大学百年志(1905~2005)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29.
- [9] [加] 许美德. 1896~1996: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26.
-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101.

责任编辑: 赖志超

Social Functions Research on High Education in Primary Foundation of PRC

CHENG Jia-fu¹, DONG Mei-ying²

(1. School of Law &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 Industry, Hefei 230022, China;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power was transformed and the society was restructured. In the process of restructure of the new social structure system, high education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rough the quick transformation of graduates into workers and farmers, the high education changed this low status group to be a powerful group in new society. And a lot of social elites who controlled the power emerged. However, many former powerful classes were fenced in the lower status.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high education focused more on the social restructure.

Key words: high education; social functions; restructure

① 曼海姆认为教育是一个对大众社会进行重构的重要工具。见谢维和. 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第43页。